马列毛主义者基础书单之
帝国主义和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编

2023

声明

本 pdf 文件由志愿者制作，内容搜集自 telegram 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其频道链接是 t.me/proletarianstruggles。

编者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联系方式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从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敌人。因此，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必然会用尽各种办法攻击我们党，可以预见到阶级敌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表面上假扮成支持我党**的口吻，**事实上却肆意编造谣言来歪曲我党的主张**，甚至**冒充我党党员发表反动言论，把我们从未说过的话强行按在我们头上**，把我党抹黑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赤匪或者极端“左”倾的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借此欺骗恐吓小资产阶级群众远离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迫使群众对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预先发布下列联系方式和 GPG 公钥，以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联系我党和了解我们的立场，摆脱资产阶级的谎言。

我们的**公开群组**对所有进步群众开放，只要不发表反动言论都可以留在群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个加入群组的人的真实身份，不可能把警察、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等等绝对排除在公开群组以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必然潜藏在群众里伺机而动。因此，各平台的**公开群组**里鱼龙混杂，**群成员的言论仅能代表发言者个人，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立场**。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只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上公布和验证过的宣传平台能够代表我们党的正式立场，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骗子。

一、网站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jiashigrsyt1.github.io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proletarianstruggles.github.io

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

二、邮箱

佳士工人声援团联络邮箱

jiashigrsyt@protonmail.com

斗争报邮箱

douzhengbao@protonmail.com

三、Telegram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t.me/JSshengyuan

管理员电报账号

https://t.me/jsgrsyt

https://t.me/zgmzdzygcd

四、Matrix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app.element.io/#/room/#proletarianstruggles:matrix.org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app.element.io/#/room/#JSshengyuan:matrix.org

管理员 Matrix 账号

https://app.element.io/#/user/@jiashigrsyt:matrix.org

https://app.element.io/#/user/@mcpc:matrix.org

五、Keybase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团队

https://keybase.io/team/douzhengbao

管理员 Keybase 账号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

六、XMPP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jsshengyuan@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管理员 XMPP 账号

jsgrsyt@conversations.im

mcpc@yax.im

七、GPG 公钥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pgp_keys.asc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files.wordpress.com/2023/11/pgp_keys.asc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pgp_keys.asc

目录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1] 1

注释： 6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1] 7

初版（国外版）序言 7

第二版序言 7

注释： 8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 1914—1915 年的战争 9

注释： 24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25

注释： 31

第三章 重建国际 31

注释： 37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39

注释： 45

论欧洲联邦口号 49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53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 54

一 54

二 57

三 60
注释： 64
战争与革命[1] 71
注释： 90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1]

列宁（1914 年 10 月 1 日〔14 日〕）

报告人把报告分成两部分：弄清这次战争的性质和阐明社会党人对这次战争的态度。

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而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判明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对它的态度。否则就会对问题作出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折中主义的解释。

根据历史环境、阶级关系等情况，对于战争，在不同的时期应当持不同的态度。永远地根本拒绝参加任何战争是荒谬的。另一方面，把战争分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也是荒谬的。马克思在 1848 年之所以痛恨俄国，是因为当时落后的俄国的反动魔掌压制着德国的民主力量，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发展，不能把国家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整体。

为了弄清自己对这次战争应采取的态度，必须了解这次战争同过去的战争有什么不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资产阶级作过这种说明吗？没有。不仅过去没有作过，而且今后也绝不会作出这种说明。如果从社会党人中间目前发生的情况来判断，或许会以为他们也不了解这次战争的特殊性质。

其实，社会党人对这次战争已经有过十分清楚的说明和预见了。而且，在社会党议会代表的任何一次演说中，在社会党政论家的任何一篇文章中，都包含有这种说明。这种说明非常简单，以致人们竟不大注意，然而这种说明却提供了如何正确对待这次战争的锁钥。

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性质。

为了弄清这种性质，必须研究一下以前的各次战争是怎么回事，帝国主义战争又是怎么回事。

列宁相当详细地分析了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的各次战争的性质。这些战争都是民族战争，它们总是伴随着并且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

这些战争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反映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同封建社会的斗争。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语言自由和人民代议制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建立这个在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上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基础。

从法国大革命起直到意大利的和普鲁士的多次战争，其性质都是如此。

民族战争的这个任务，有的由民主派本身完成，有的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完成，——这是不以战争参加者本身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使现代文明获得胜利，使资本主义繁荣昌盛，把全体人民和各个民族都吸引到资本主义方面来——这就是民族战争即资本主义初期的战争的目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点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派别的社会党人之间过去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应采取的态度的决议案时，大家都一致地认为这次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战争。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达到同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们都已经提供了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输出的已经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了。资本主义在本国范围内已经容纳不下，所以现在便来争夺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些未被占据的地盘。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民族战争曾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开始，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则表明资本主义的终结。

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政治。

帝国主义给当前的战争打上完全不同的烙印，把它和以往所有的战争区别开来。

只有把这次战争同它的特殊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象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到的那样，我们才能弄清自己对它应采取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会搬用那些在另一种环境中、在旧的环境中使用的陈旧的概念和论据。关于祖国的概念和上面提到的把战争划分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就属于这类陈腐的概念。

当然，就是在当前，在活生生的现实画面上也还残留着旧色彩的斑痕。例如，在所有交战国当中，唯有塞尔维亚人还在为民族生存而战。在印度和中国，觉悟的无产者也只能走民族的道路，因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如果中国为此而不得不进行进攻性战争的话，我们也只能加以支持，因为这在客观上将是进步的战争。马克思在 1848 年所以可以宣传对俄国的进攻性战争，道理也就在这里。

总之，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政治。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社会党人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的时代。当前的斗争就是为了瓜分剩下的一点地盘。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项历史任务。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这样的战争可能会爆发若干次，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完全不是过去那种战争，因此，社会党人面临的任务也在发生变化。

为了完成这些新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就会需要完全另一种类型的组织

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仔细而周密地考察了各种经济现象，并且非常慎重地从中作出了结论，他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与过去那种和平的渐进的发展完全不同的阶段……

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式应当是什么样的，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为了完成新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组织或改造旧的组织。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的那种害怕打乱自己的组织的情绪，是相当荒谬的，这种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主义，是非常荒唐的。我们知道，彼得

堡委员会印发了反战的秘密传单。高加索组织和俄国其他一些组织也这样做了。毫无疑问，在国外也可以这样做而同时并不断绝各种联系。

当然，合法性是一种十分宝贵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曾经说："资产者老爷们，请你们先动手破坏自己的合法性吧！"[2]现在发生的情况，也许会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教育，因为一向夸耀自己容许合法性的政府，竟毫不客气地全面破坏了合法性。在这方面，柏林卫戍司令的粗暴的命令也许是大有教益的，他迫使《前进报》在第 1 版上登载了这个命令[3]。但是，《前进报》既然因惧怕查封而放弃了阶级斗争，并答应在战争结束前不再谈论阶级斗争，那它就是已经自杀了。正如现在欧洲一家最好的社会党报纸——巴黎的《呼声报》正确指出的：《前进报》已经死亡。过去我同马尔托夫经常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就愈是应当肯定地说，这位著作家现在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做的。他批评自己的政府，他揭露自己的资产阶级，他责骂自己国家的部长。而有些社会党人却在自己的政府面前解除武装而专门揭露和辱骂别国的部长和统治阶级，他们扮演的是资产阶级著作家的角色。休特古姆本人客观上正在扮演德国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正如有些人在扮演法俄这两个盟国的代理人的角色一样。

不理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能用历史观点观察这场战争的社会党人，就根本不会懂得这场战争。他们只能这样天真幼稚地设想这场战争：一个人在夜间掐住了另一个人的喉咙，于是邻居们不得不来拯救被害者，或者胆怯地把门"锁上"（普列汉诺夫语），免惹是非。

我们不要让自己受骗，让资产阶级的谋士们把战争解释得这么简单：好象大家本来和和平平，突然一个人发动了进攻，另一个人则起来自卫。

列宁同志读了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刊载的卢扎蒂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这位意大利政治家在这篇文章中高兴地说，战争中的伟大胜利者是……祖国，是祖国这个概念，他重复说，应当记住西塞罗的一句话："内战是最大的灾难。"

这就是资产者已经设法办到的事情，这就是最使他们激动和高兴并为此花费了大量财力和精力的事情。他们竭力要我们相信，这场战争仍然是过去常见的那种民族战争。

不。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

我们大家都等待这场帝国主义战争，都在为它作准备。既然如此，是谁发动了进攻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大家都在准备战争，而发动进攻者不过是认为这个时机对他比较有利而已。

接下去，列宁同志谈到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祖国”这个概念的定义问题。

这个概念在《共产党宣言》的光辉篇页中已有确切而明白的规定，这些篇页已经完全得到实践的验证。列宁宣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祖国的概念被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而在这以后就成为多余的东西。无产阶级不能爱它所没有的东西。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社会党人在当前的战争中的任务是什么呢？

列宁同志宣读了后来在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得到确认和补充的斯图加特决议。这项决议明确指出了社会党人同导致战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方法，以及他们对于已经爆发的战争的义务。这些义务是根据俄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先例确定的。由于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刑事法规，斯图加特决议写得很谨慎，但是决议中指出的任务是很明确的。巴黎公社是国内战争。形式、时间和地点如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工作方针是规定得很明确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同志接着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社会党人实际上所采取的立场。正如意大利的《前进报》指出的，除了塞尔维亚人以外，俄国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凯尔一哈第通过揭露爱德华·格雷的政策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想要回避它已不可能。必须行动起来，去做社会党人应做的事情。人们在战争中所想的和考虑的多半比“在家里”要多些。应当到那里去，在那里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去实现最终目的，因为，以为无产阶级将会通过和平道路达到最终目的，那是空想。不打破民族的框框就不能从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就象当年没有民族思想便不能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一样。

注释：

[1]列宁于 1914 年 10 月 1 日（14 日）在瑞士洛桑市民众文化馆作了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三天前，格·瓦·普列汉诺夫也是在这里作了题为《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报告。列宁的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这里收载的是 1914 年 10 月 25 日和 27 日《呼声报》第 37 号和第 38 号发表的该报记者（署名为：g．h.）的记录。

列宁还于 10 月 2 日（15 日）在日内瓦作了题为《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报告，报告稿也没有保存下来。——[33]。

[2]列宁对恩格斯原话作了引申。恩格斯的原话是：“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92 页）——[36]。

[3]见注 69。——[37]。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1]

列宁（1915 年 7—8 月）

初版（国外版）序言

战争已经进行一年了。我们党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确定了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是在 1914 年 9 月拟定，1914 年 11 月 1 日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注：见本卷第 12—19 页。——编者注] 第 33 号上发表的（事先曾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和我们党在俄国国内的负责代表，并征得他们同意）。以后在第 40 号（1915 年 3 月 29 日）上又刊载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同上，第 163—169 页。——编者注]，这些决议更准确地阐述了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策略。

目前俄国群众的革命情绪在显著地增长。在其他国家里，尽管大多数已经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在压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群众革命情绪增长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出版一本小册子，总结一下社会民主党对这场战争的策略。在全文刊印上述党的文件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文件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尽量考虑到文献中和党的会议上提出过的赞成资产阶级策略或无产阶级策略的一切主要论据。

第二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在 1915 年夏天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2]召开前夕写成的。小册子还用德文和法文出版过，并译成挪威文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上全文发表过。小册子的德文版是秘密运到德国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及其他城市，由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派在当地秘密散发的。法文版

是在巴黎秘密印刷，由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在当地散发的。俄文版传到俄国的份数非常有限，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们采用了手抄的办法。

现在我们把这本小册子作为文件全文重印出来。读者应该时刻记住，小册子是在 1915 年 8 月写成的。而读到涉及俄国的地方，尤其要记住这一点，记住俄国当时还是沙皇的俄国，罗曼诺夫的俄国……

注释：

[1]《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这本小册子写于 1915 年 7—8 月，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召开的前夕。小册子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合写的，列宁撰写了小册子的主要部分（第 1 章和第 3、4 章的一部分），并且审订了全书。小册子还在书末作为附录收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和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列宁把这部著作称为“对我们党的决议的注释，也就是对决议的通俗的说明”。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最初于 1915 年 8 月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且散发给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小册子又在法国用法文出版，并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用挪威文全文发表。列宁还曾多次尝试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未能实现。1917 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由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于 1918 年在彼得格勒出版。——[319]。

[2]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 1915 年 9 月 5—8 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 11 个欧洲国家的 38 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321]。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 1914—1915 年的战争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

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对目前这场战争，必须研究它的历史特点。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为止，从 1789 年起到 1781 年为止，战争的类型之一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换句话说，这些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在于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因此这些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希望对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起了促进作用的那个国家（即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有过法国人掠夺和侵占他国领土的因素，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或震撼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次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使数千万德国人民摆脱了封建割据状态，摆脱了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专制君主的压迫。

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区别

1789—1871 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就这种时代的战争所说的“防御性”战争的合理性，一向就是指这些目标，即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性”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就用过这个用语）[3]。社

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性”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但是假定说，一个拥有 100 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一个拥有 200 个奴隶的奴隶主开战。显然，在这种场合使用“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说是一种伪造，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百姓、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当前这场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目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人们所歪曲，他们不是单方面地加以运用，就是寻找借口说这场战争还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 20 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

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把所谓“大”国（即在大规模的掠夺中卓有成效者）瓜分世界的一些确切数字列举如下：

奴隶主“大”国瓜分世界的情况

“大”国	殖民地 1876年 平方公里 单位百万	人口 单位百万	殖民地 1914年 平方公里 单位百万	人口 单位百万	宗主国 1914年 平方公里 单位百万	人口 单位百万	共计 平方公里 单位百万	人口 单位百万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6个“大”国…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不属于大国（而属于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殖民地………			9.9	45.3			9.9	45.3
3个“半殖民地”国家（土耳其、中国和波斯）							14.5	361.2
总计……							105.9	1367.1
其余国家和地区………………………………							28.0	289.9
全球（两极地区除外）………………………							133.9	1657.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 1789—1871 年间大多曾率领其他民族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今天，在 1876 年以后，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过度成熟”，已经变为全球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从 1876 年起到 1914 年止，6 个“大”国抢占了 25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抢占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6 个大国奴役着 5 亿以上（52300 万）的殖民地居民。这些“大”国平均每 4 个人奴役着“它们的”殖民地的 5 个居民。同时大家知道，殖民地是用火与剑抢夺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野蛮的虐待，他们遭受着各式各样的剥削（如资本输出、租借等、商品销售中的欺骗行径、对“统治”民族当局的强制服从，等等）。英法资产阶级欺骗人民说，他们是为了各民族和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

是为了保存他们抢夺来的大量殖民地而战。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肯把自己的殖民地“公平合理地”分给德国帝国主义者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就会立刻退出比利时等地。目前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从资产阶级的公平和民族自由（或民族生存权）的观点来看，德国反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对的，因为它殖民地“分得少”，它的敌人所压迫的民族比它所压迫的要多得多，而在它的盟友奥地利那里，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享有的自由无疑比在沙皇俄国这个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里享有的自由多些。但是德国本身并不是在为解放其他民族，而是在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战。社会党人决不应当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那些较老的因吃得过多而撑坏了肚子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强盗之间的斗争，去把他们统统打倒。为此，社会党人应当首先向人民说明真相，也就是说，指出这场战争从三种意义上说是奴隶主为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这是一场要通过更“公平地”瓜分从而更“和睦地”剥削殖民地来加强对殖民地的奴役的战争；第二，这是一场要在“大”国国内巩固对异族的压迫的战争，因为无论奥地利或俄国（俄国比奥地利要厉害得多，糟糕得多）都是专靠这种压迫来维持，并且靠战争来加强这种压迫的；第三，这是一场要巩固雇佣奴隶制并延长其寿命的战争，因为无产阶级已被分裂，已被压制下去，资本家则得到各种好处：发战争财，煽起民族偏见，强化反动势力，——目前这种反动势力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制最完善的国家里也开始抬头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

这是论述军事问题最深刻的著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这场战争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当前这场战争所继续的，正是这种政治，也只能是这种政治。尤其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无论平时的政治还是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解放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附属国里，近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唤起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治。在这种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只要把目前这场战争看作各“大”国及其国内的主要阶级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就可以立刻看出，那种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的看法是极端反历史的、骗人的和虚伪的。

比利时的例子

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4]）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俄国是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最爱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他们错了。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和其他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只要需要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我们姑且假定，一切愿意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假如是这样，社会党人当然会站在德国的敌人一边。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三协约国（或四协约国）”并不是为了比利时而进行战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伪君子才会隐瞒这一点。英国正在抢夺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俄国正在抢夺加里西亚和土耳其，法国在力争得到阿尔萨斯－洛林、甚至莱茵河左岸地区；同意大利签订了分赃条约（瓜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进行一笔交易，同样是为了分赃。在各国现在的政府所进行的目前这场战争的条件下，不帮助扼杀奥地利或土耳其等，

就不能帮助比利时！这跟“保卫祖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历史上已经过了时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府间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的特点。谁为参加这场战争辩护，谁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对各民族的压迫永世长存。谁宣传要利用各国政府目前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在维护真正是一切民族的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俄国在为什么而战？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总的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多数居民进行这样的压迫：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 43％，即不到一半，而其余一切民族都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 17000 万人口中，有近 1 亿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并彻底扼杀乌克兰人的自由，是为了夺取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沙皇政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注意力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一种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压迫着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这场战争增加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量，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既然有可能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经济停滞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以对“异族人”的半封建的剥削作为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发展生产力。因此，从俄国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就具有特别反动和反民族解放的性质。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

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所推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主张“保卫祖国”，而是维护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鬼话，似乎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有人为某一参战大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也有人象考茨基那样，认为所有交战大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或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力，也就完全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巴塞尔宣言

1912 年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正是指 1914 年爆发的英德两国及双方现在的盟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宣言明确宣布，对于以大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基础、“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它辩护的。宣言明确宣布，战争“对各国政府”（毫无例外）是危险的，指出各国政府都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明确地举了 1871 年公社和 1905 年 10 月至 12 月事件即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因此，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制定了各国工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用资产阶级解放的观点为这场战争辩护，他们主张“保卫祖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等等，等等，是对社会主义的直

接背叛；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这种背叛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已经在欧洲的大多数党内取得了胜利。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援引马克思在 1870 年的战争中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大卫之流一类的人）援引恩格斯 1891 年的言论：一旦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社会党人有义务保卫祖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93—298 页。——编者注］；最后，那些想使国际沙文主义调和并合法化的考茨基一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谴责战争，可是从 1854—1855 年到 1870—1871 年和 1876—1877 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的某一方。

凡此种种引证都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象吉约姆一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1870—1871 年的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在战胜拿破仑第三之前，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一道，多年来一直压迫德国，使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是战争一转变为对法国的掠夺（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地谴责了德国人。而且在这次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拨款，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一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和民族解放意义的战争的评价套用到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上来，这是对真理的嘲弄。至于 1854—1855 年的战争以及 19 世纪的一切战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当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所有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

恰恰没有巴塞尔宣言针对大国间的战争据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2 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庄严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1889—1914 年）国际的破产。我们应当弄清引起这种破产的原因，弄清产生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以及社会沙文主义的力量从何而来。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内，每个社会民主党内都进行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了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不疑：机会主义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19 世纪末的客观条件特别加强了机会主义的力量，使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战争加速了发展进程，使机会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成了公开的联盟。同时军事当局到处实行戒严，压制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原来的领袖几乎全部倒向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如果从总体上来观察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哪怕是最有威望的人物），那么就可以发现，恰恰是机会主义派别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支柱，而从革命者的阵营中几乎到处都比较一贯地发出了对这个派别的抗议。如果以 1907 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情况为例，那么就可以发现，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当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就是分裂国际的革命工人阶级

在过去，在大战以前，机会主义虽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偏向”和“极端”，但仍然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战争表明将来不可能再是这样了。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充分地起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特使的作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已成为十足的伪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例子。在一切重要场合（例如 8 月 4 日的投票）机会主义者都要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而实现这种通牒则靠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靠他们在工会理事会等

机构里面的多数。现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其他民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

不管在某些场合同在许多组织中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会多么困难，不管把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工人政党的过程在各个国家里会多么不同，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取得成果。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在死亡；正在复兴的社会主义，按照法裔社会党人保尔·果雷的恰当说法，“将是革命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5]。

“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6]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投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 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 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考茨基主义”的这种根本的虚伪性，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荷兰，罗兰－霍尔斯特虽然拒绝保卫祖国的思想，却坚持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的统一。在俄国，托洛茨基虽然也拒绝这种思想，却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集团的统一。在罗马尼亚，拉柯夫斯基虽然把机会主义看作国际破产的祸首而向它宣战，同时却又欣然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潘涅库克）曾经称之为“消极的激进主义”的祸害的表现，这种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软弱无能。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战争无疑造成了最尖锐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这场战争的反动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以“民族”观念掩饰其掠夺目的而编造出的无耻谎言，这一切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正在不可避免地激起群众的革命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情绪，加深和发展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任何彻底的阶级斗争，任何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我们无法知道，触发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将是列强之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它将发生在战争期间，还是发生在战后，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一贯地和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

巴塞尔宣言直接举了巴黎公社即变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半个世纪以前，无产阶级力量还太弱，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所有交战国内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一部分巴黎工人迷恋于“民族观念”（1792 年的传统），这是马克思当时就指出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公社失败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能够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在今天，如果一个社会党人甘心拒绝以巴黎公社战士的精神去从事活动，那是不可宽恕的。

战壕联欢的例子

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报道了各交战国士兵甚至在战壕内联欢的事例。军事当局（德国和英国的）所颁布的严禁这种联欢的命令证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欢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中机会主义完全占统治地位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报刊、第二国际的所有权威都支持社会沙文主义的情况下，还能发生联欢的事例，这就向我们表明，只要朝这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哪怕只有所有交战国的左派社会党人进行工作，那么缩短目前这场罪恶的、反动的和奴隶主的战争，组织国际的革命运动，是非常可能的。

秘密组织的意义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都因其社会沙文主义而出了丑（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一样），其出丑的程度并不亚于机会主义者。这场战争的一个有益的结果无疑是：它将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齐打垮。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屏弃崇拜合法性的思想。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要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表明，在所有的国家

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在破坏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例如在德国，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堂堂正正的事情，都是违背卑鄙的机会主义和伪善的“考茨基主义”的意愿的，而且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英国，印发号召人们不去参军的传单，就要被送去服苦役。

认为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报刊上嘲笑这些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主张自己的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人和主张“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进行的活动的要求。

毫无疑问，一部分英国、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党人所进行的认真的反战宣传，“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宣传正是社会党人的一大功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他们没有别的生路，只有用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他们应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这些政府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游行示威。但是他们不能

欺骗人民，不能传布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进行革命运动也可以实现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掠夺、不含现在的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这样欺骗人民，只会有利于各交战国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来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英国人答应给比利时自由，德国人答应给波兰自由，等等。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场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者为巩固和扩大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战争。

社会党人不同一切民族压迫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维护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是政治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大国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维护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维护这种权利不但不会鼓励形成小国家，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因而更广泛更普遍地形成更有利于群众和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注释：

[3]指威·李卜克内西在 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324]。

[4]意大利于 1915 年退出同盟国而加入协约国，使三协约国成为四协约国。——[328]。

[5]1915 年 3 月 11 日瑞士社会党人保·果雷在瑞士洛桑作了题为《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当年，他把报告印成了小册子。详见列宁的《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7 卷）一文。——[335]。

[6]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人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35]。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资产阶级和战争

俄国政府有一点是不落后于它的欧洲伙伴的：它也能够象它们那样大规模地欺骗“自己的”人民。无比庞大的撒谎和欺骗机器在俄国也开动了起来，其目的就是用沙文主义毒害群众，就是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沙皇政府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是在无私地保卫“斯拉夫同胞”等等。

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热烈支持沙皇政府的黩武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在期待着能从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遗产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特权。他们已经在一系列会议上预先设想了沙皇军队获胜时大量金钱源源流入他

们口袋的情景。而且反动派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和延缓新的革命在俄国爆发的话，那只能是一场使沙皇获胜的对外战争。

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等广大阶层，也沾染了沙文主义，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是如此。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立宪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就是政府党了。沙皇外交已经不止一次用来进行大规模政治欺骗的泛斯拉夫主义，已经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了。俄国的自由派已经退化为民族主义自由派。它正在与黑帮进行“爱国主义”竞赛，任何时候都乐于投票拥护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等等。在上一世纪 70 年代，德国“自由思想”自由派陷于瓦解，从中分离出一个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目前在俄国自由派阵营内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俄国的自由派仍然是俄国革命的动力，他们的这种观点已被实际生活所粉碎。

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报刊和僧侣等等的协助下，在农民中也煽起了沙文主义情绪。但是随着士兵从战场不断返回，农村中的情绪无疑会变得不利于沙皇君主政府。同农民有联系的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没有能抵挡住沙文主义的浪潮。劳动派在国家杜马中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可是，通过自己的领袖克伦斯基的口，他们却发表了一篇对君主政府特别有利的“爱国”宣言。“民粹派”的所有合法报刊总的说来都尾随自由派。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即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局的所谓社会革命党，也顺应了这个潮流。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先生，已经作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出面了。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这个党有半数代表投票赞成一项沙文主义的决议（另一半代表弃权）。

沙文主义者在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新闻报》[7]等等）中占有优势。“来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即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产。克鲁泡特金、布尔采夫和鲁巴诺维奇的可悲的命运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工人阶级和战争

俄国唯一没有沾染上沙文主义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个别过火行动只牵涉工人中最愚昧无知的阶层。工人参加莫斯科反对德国人的粗暴行动一事被过分夸大了。整个说来，俄国工人阶级对沙文主义是有免疫力的。

这种情况可以从国内的革命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1912—1914 年标志着俄国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的开始。我们又一次亲眼看到了一场举世无双的伟大的罢工运动。1913 年参加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人数，按最低估计有 150 万人，1914 年则超过了 200 万人，接近 1905 年的水平。战争前夜，彼得堡的形势已发展到发生了首批街垒战的地步。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履行了自己对国际的义务。国际主义的旗帜在它的手中从未动摇过。我们党早就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了。机会主义和“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主义”没有成为我们党的脚镣。这种情况帮助了我们党去履行革命的义务，正象同比索拉蒂的机会主义党决裂帮助了意大利的同志一样。

我国的总的形势不容许“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盛行。在俄国，我们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它们对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的影响却很小。工人和职员的特权阶层在我国力量非常微弱。在我们这里没有形成对合法性的盲目崇拜。战前，取消派（阿克

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和马斯洛夫等领导的机会主义政党）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支持。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所有 6 名工人代表，都反对取消主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合法工人报纸的发行份数和捐款情况无可置辩地证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反对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

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逮捕和放逐了成千的先进工人——我们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这种情况，再加上国内实行戒严、我们的报纸被封闭等等，使运动受到了阻碍。然而我们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进行着。我们党的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呼声报》[8]。

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在彼得格勒翻印出来，并送往各省。出版了各种秘密传单，有的甚至散发到兵营中去。在城郊的各个僻静地方，工人举行秘密集会。最近在彼得格勒爆发了五金工人的大罢工。我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就这些罢工事件印发了几篇告工人书。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1913 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中间发生了分裂。一方是齐赫泽领导的 7 名拥护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是由 7 个非无产阶级省份选出的，这 7 个省计有 214000 工人。另一方有 6 名代表，他们全部是由俄国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工人选民团选出的，这些地区计有 1008000 工人。

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实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还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实际上分歧主要表现在议会以外的群众工作方面。在俄国，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想要坚持革命立场的话，那他就必须秘密地进行。齐赫泽党团仍然是反对秘密工作的取消派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同工人的一切谈话中和在一切会议上，都袒护取消派。由此就发生了分裂。6 名代表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

党工人党团。一年来的工作无可争辩地表明，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是拥护这个党团的。

战争爆发时，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局限于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它要是投赞成票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在俄国甚至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对社会沙文主义提出过异议。

贯彻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行了反帝国主义宣传。

这个党团赢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这使政府大为惊慌，它不得不公然违犯自己颁布的法律，逮捕了我们的代表同志并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在逮捕我们的同志的第一个正式文告中写道：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某些成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立场，他们的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用秘密传单和口头宣传进行的反战鼓动来动摇俄国的军事力量。”

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暂时”停止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这一人所共知的号召，只有我们党通过中央委员会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从沙皇驻比利时公使库达舍夫公爵的证词中已经得知，这个号召不是王德威尔得一个人起草的，而是同这位沙皇公使一起拟定的。取消派的领导核心赞同王德威尔得，在报纸上正式宣称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抵制战争”。

沙皇政府首先指控我们的代表同志说，他们在工人中宣传了这个对王德威尔得的否定的答复。

沙皇检察官涅纳罗科莫夫先生在审判中举出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作为我们的同志的榜样。他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成了政府的朋

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愁容骑士们却没有这样做……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一起都忘记了自己同其他阶级的纷争，忘记了党派纠纷，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旗帜下面。”他说，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们却遵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这样做……

这次审判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广泛地进行秘密反战宣传的动人图景。当然，沙皇法庭“查出来的”远远不是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是仅仅所查出的活动已经说明，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多么大量的工作。

在审判中，宣读了我们的一些小组和委员会所散发的反对战争和拥护国际主义策略的秘密号召书。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和全俄国的觉悟工人都有联系，并且尽力去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这场战争。

哈尔科夫省工人的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同志在法庭上说：

“我知道，我被人民派到国家杜马里来不是为了坐杜马的安乐椅，我到过许多地方，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情绪。”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担负了我党秘密鼓动员的任务，并在乌拉尔的上伊谢季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人委员会。这次审判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在战争爆发后，为了进行宣传而几乎走遍了全俄国，说明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等人组织了许多次工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等等。

沙皇政府用死刑恫吓被告。因此，他们在法庭上并不是都表现得象穆拉诺夫同志那样勇敢。他们竭力使沙皇检察官难于给他们定罪。这一点现在正被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卑鄙地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工人阶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议会活动？

休特古姆和海涅、桑巴和瓦扬、比索拉蒂和墨索里尼、齐赫泽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议会活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同志们也承认议会活动，同沙

文主义者决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同志也承认议会活动。议会活动有各种各样。一些人利用议会舞台是要讨好自己的政府，或者至多不过象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履行自己作为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职责。一些人的议会活动使他们坐上部长的安乐椅，另一些人的议会活动则使他们坐监牢，被流放，服苦役。一些人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些人则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一些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注释：

[7]《新闻报》(《новости》)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日报），1914 年 8 月—1915 年 5 月在巴黎出版。——[343]。

[8]《无产者呼声报》(《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гоп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15 年 2 月—1916 年 12 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 4 号。最后一号被警察没收，抢救出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该报创刊号曾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344]。

第三章 重建国际

应当怎样重建国际呢？不过，先要谈一谈不应当怎样重建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哦，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为国际操尽了心。一方面他们要人相信：说国际破产，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请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战时自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摆脱现状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国际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到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做得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象兄弟一样和睦相处，而在战时我们就应当恪守某项某项决议，号召德国工人消灭自己的法国兄弟，号召法国工人消灭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在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之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一方严肃的社会党人都没有认为人们必须为”国际的命运“担忧”。普列汉诺夫说，“握沾有无辜被杀害者的鲜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使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国际应当接受即使是事后表示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不屈不挠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沃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不打算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当时那些态

度明确的沙文主义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自己“祖国”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卢加诺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9]、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10]。这些会议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建”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而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毫无疑问，一切国际主义者最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内部的情况。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这一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在欧洲的大党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仍然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和《国际》杂志。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人们在散发秘密的革命呼吁书，例如《主要敌人在本国》这样的呼吁书。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派别：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象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扮演任何别的角色；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民主派。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他们的情况怎样呢？

《国际》杂志说得很对，德国的左派还处于动荡之中，还将发生巨大的重新组合，他们的内部有比较坚定的分子，也有不够坚定的分子。

不言而喻，我们俄国国际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干涉我们的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才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来确定自己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对情况的看法。我们深信《国际》杂志的社论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他断言，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现在谁抹杀意见分歧，现在谁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考茨基主义所宣传的东西，谁就是在麻痹工人，就比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使工人不得不自己去辩别是非的休特古姆和海涅之流更为有害。

考茨基和哈阿兹最近竟同“领导机关”对抗起来，这样做是迷惑不了任何人的。他们和谢德曼分子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已经胜利了，因此现在已经可以放手抗议兼并了。另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还没有胜利，因此应当“坚持到底”。

考茨基派反对“领导机关”的斗争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战争发生后对工人掩饰原则性的争论，用一千零一个以模模糊糊的“左的”精神起草的冗长的决议把问题掩盖起来。而起草这样的决议，第二国际的外交家们都是能手。

十分明显，德国反对派在反对“领导机关”的困难斗争中，也应当利用考茨基派的这种非原则性的对抗。但是，检验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试金石，应当仍然是看他是否对新考茨基主义持否定态度。只有反对考茨基主义，只有懂得即使在自己的领袖实行假转变之后“中派”在原则问题上仍然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盟友的人，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对国际中所有的动摇分子持何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分子——主要是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在中立国和在某些交战国中都有（例如在英国有独立工党）。这些分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和他们搞好关系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他们仅仅是同路人，他们在重建国际的主要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会拥护我们而会反对我们，他们会拥护考茨基、谢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的俘虏。例如，在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就是这样。持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观点的德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起了“中派”的作用。这次妇女代表会议所谈的，仅仅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荷兰机会主义党的代表和独立工党（Ｉ．Ｌ．Ｐ．）的代表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在“协约国”沙文主义者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工党曾投票赞成王德威尔得的决议案。我们对独立工党在战时对英国政府所作的英勇斗争表示最大的敬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是怎样看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提出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即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变为国内战争时代的起点。

不管怎样，在许多国家里都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霍格伦同志所代表的有影响的一派）、巴尔干（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意大利、英国（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法国（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抗议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以及荷兰（论坛派[11]）等国家中，都有这样的人。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管起初他们的数量多么少），以他们的名义让人们回忆回忆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

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比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真正的行动纲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为只有这种纲领能够完全而清楚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只有那种足以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要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能保证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就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现在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又变成了沙文主义者。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必要的。我们确信，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社会党人同后者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普鲁士年鉴》上说得很对，目前的统一有利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因为它迫使左派服从沙文主义者，妨碍工人弄清争论的实质，妨碍工人建立自己的真正工人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象过去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等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就应当建立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切知道并且确信不疑的是，我们党将朝着上述方向在我们的国家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

在我们俄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集团也不乏其例。这些人将反对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和休特古姆站在同一基本立场上的，并且现在已经向休特古姆伸出亲善之手。我们知道，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所谓“组织委员会”正在鼓吹俄国土地上的考茨基主义。这些人借口工人阶级的统一，鼓吹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并通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统一。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前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情况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同我们党站在一起。

注释：

[9]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即 1915 年 1 月 17—18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社会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建议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敦促本国政府在交战国之间充当调停人和加速恢复和平。——[349]。

[10]指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于 1915 年 4 月 4—6 日在伯尔尼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保加利亚、德国、荷兰、丹麦、意大利、挪威、波兰、俄国、瑞士、瑞典共 10 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战争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代表会议是在中派分子罗・格里姆的影响下组织和筹备的。

为了利用代表会议来团结青年国际主义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伊・萨法罗夫参加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把一份包含有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论点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审查。这一草案是根据列宁为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写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 220—222 页）拟的。但是代表会议没有通过这个决议，而通过了根据中派的精神写的决议。

代表会议选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通过了关于出版社会主义青年的国际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决议，并决定每年庆祝国际青年节。——[249]。

[11]论坛派是 1907—1918 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 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

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 年 2 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 3 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 年 11 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353]。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策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 30 年来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一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向读者提醒党的历史中的一些主要事实。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派别，产生于 1883 年。那时，“劳动解放社”[12]在国外第一次针对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 90 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派别。90 年代初期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和“火星派”。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 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如下这样一个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主义所“承认”的是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而合乎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局限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 年）为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都站到了《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的几年内提出了一项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纲领。1905 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了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考虑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曾经提出过的。早在 20 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见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事情了。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 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捍卫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斗争则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急风暴雨般的 1905—1907 年，孟什维主义是受自由派资产者支持的、在工人运动中传播自由派资产阶级倾向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是：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如孟什维克自己也屡次承认的那样，在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行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 年革命考验、加强、深化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行动，不止一次地暴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派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 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孟什维主义中的主流派不顾它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反对，掀起一股取消主义思潮，即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另一次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嘲笑共和国的口号等等。《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法著作家集团（波特列索夫先生、切列万宁先生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想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并且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在两年多（1912 年初至 1914 年中）的时间里，两个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个是 1912 年 1 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后者拒不承认一月代表会议，并企图按另一种方式即通过与《我们的曙光》集团保持统一去恢复党。两种工人日报（《真理报》和《光线报》[13]以及它们的后继者）之间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真理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之间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传统，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 1912 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取消派——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通过《我们的曙光》集团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核查的）交纳社会民主党党费的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下面就是关于

这些捐款的简要材料，这些材料详尽地刊载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4]一书中，并摘要登载在 1914 年 7 月 21 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上。

1914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3 日，分别捐款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派的）日报和取消派的日报的捐款次数和捐款总额如下：

	真理派		取消派	
	捐款次数	捐款总额（单位卢布）	捐款次数	捐款总额（单位卢布）
工人团体……	2873	18934	671	5296
非工人团体……	713	2650	453	6760

由此可见，到 1914 年，我们党已经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周围。1913 年全年，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 2181 次，给取消派捐款 661 次。1913 年 1 月 1 日至 1914 年 5 月 13 日，工人团体给“真理派”（即我们党）捐款 5054 次，给取消派捐款 1332 次，即占 20.8%。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 年）

1914—1915 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验自己的策略。这场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反动性和掠夺性，从沙皇政府方面看，要比从其他各国政府方面看更加明显得多。尽管如此，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在俄国，除了我们党，它是唯一有重大影响的集团，因为它和自由派有广泛的联系）还是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我们的曙光》集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独占合法地位，在群众中鼓吹什么“不抵制战争”、希望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获胜、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犯了“滔天罪行”等等。自 1903 年以来，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表现出毫无政治气节，曾多次转向机会主义者，现在他更加坚决地采取了这种立场，从而博得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称赞。

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到宣称沙皇政府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并在意大利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怂恿意大利参战！！

这就完全证明，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现实纲领和他们的方针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派小资产者、极少数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 1912 年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了数不清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经得起客观检查的确凿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如果考虑到在反革命时代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困难，这个数目就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清除《我们的曙光》集团就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达到“统一”，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反对者甚至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实现统一呢？自 1912 年 1 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为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 1912 年 3 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 1912 年 8 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15]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

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 1912—1914 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1914 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正式退出了“八月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了联盟，又建立了他自己单独的集团。1914 年 7 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杂志、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阿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最好让德国失败。组织委员会和崩得庇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维护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其前身是《呼声报》），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想把空泛地捍卫国际主义和要求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报纸在出版了 250 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已经解体：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杂志[16]、列金之流指责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

一位领袖阐述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 1915 年在奉行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的《现代世界》杂志[17]第 5 期上写道：

“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制止自己国家的军事行动而没有这样做，这是暗地希望该党不仅让自己，而且让自己的祖国断送在街垒上，或者是拿无政府主义的望远镜观察近在咫尺的事物。”*［注：1915 年《现代世界》杂志第 5 期第 148 页。托洛茨基在不久前宣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齐赫泽党团在国际中的威信。毫无疑问，契恒凯里也将同样卖力气地去提高托洛茨基在国际中的威信……］*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 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 30 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注释：

[12]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356]。

[13]《光线报》（《п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

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 年 7 月 11 日（24 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358]。

[14]指《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 2 册》一书，该书于 1914 年 7 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载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取消派的文章。此处列宁是指他写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两篇文章，其中载有关于工人捐款的详细材料（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5 卷第 304—312 页和第 418—426 页）。——[359]。

[15]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 1912 年 8 月 12—20 日（8 月 25 日—9 月 2 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 29 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 18 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 名，崩得 4 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 4 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 4 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 1 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 1 名；有发言权的 11 名：组织委员会代表 2 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 1 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 1 名，《涅瓦呼声报》代表 1 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 1 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 4 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 人中只有 3 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

“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可参看列宁的《“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5 卷第 1—4、30—33、194—216 页）。——[361]。

[16]《国际通讯》杂志（《Internationale Korrespondenz》）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周刊。1914 年 9 月底—1918 年 10 月 1 日在柏林出版。——[362]。

[17]《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 年 10 月—1918 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 1914 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362]。

论欧洲联邦口号

列宁（1915 年 8 月 10 日〔23 日〕）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0 号上曾报道说，我们党的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决定把“欧洲联邦”口号问题推迟到报刊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之后再来解决。[注：见本卷第 163 页。——编者注]

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只涉及政治一个方面。其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把这个口号直截了当地表述为政治口号（宣言说：“当前的政治口号……”），同时，宣言不但提出了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而且还特地着重指出，“如果不提以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是毫无意义的和欺骗性的。[注：同上，第 17—18 页。——编者注]

在对这个口号作政治评价的范围内反对这样提出问题，例如，认为这个口号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那是完全错误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相反，它们总是在促使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为它扩展基础，吸引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

但是，如果说同以革命推翻欧洲三国最反动的君主制度（以俄国君主制度为首）联系起来提出的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这一口号，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是无懈可击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一口号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意义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和“文明的”殖民大国的输出

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资本已经变成国际的和垄断的资本。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大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欧洲四个大国英、法、俄、德，共有 25000—30000 万人口和将近 700 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它们所占领的殖民地却有近 5 亿（49450 万）人口和 64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即差不多占全球面积的一半（全球面积除两极地区外，共有 13300 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正遭到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的分割。亚洲这三个可以称之为半殖民地（其实它们现在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的国家，共有人口 36000 万，土地 1450 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全欧洲面积的一倍半）。

其次，英、法、德三国在国外的投资不下 700 亿卢布。保证从这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上每年能够得到 30 亿卢布以上的“正当”收益的，是百万富翁们的全国委员会即所谓的政府。这些委员会拥有陆军和海军，把“亿万富翁”的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当总督、领事、大使、各种官员、牧师和其他吸血虫。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时代，少数几个大国对地球上将近 10 亿人口的掠夺，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只能这样组织。能够放弃殖民地，放弃“势力范围”，放弃资本输出吗？谁这样想，谁就是把自己降低到牧师的水平，这些牧师每礼拜天都向富人宣扬基督教的崇高教义，劝他们周济穷人……每年如果不能拿出几十亿卢布，至少也拿出几百卢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根据别的基础、别的原则进行瓜分。一个亿万富翁只能“按资本”所占比例同别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且还要多一点，要让最大的资本得到比它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

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小市民和庸人的痴想。瓜分只能“按实力”进行。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的。1871 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增强要比英法快两三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而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协定，也是可能的……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仅仅是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不让他们被日本和美国夺走，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当前这种瓜分殖民地的状况感到极端委屈，而它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实力增强之快，远非落后的、君主制的、已经开始老朽的欧洲所能比拟。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把反动势力组织起来去阻碍美国的更为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第一，因为它是和社会主义交融在一起的；第二，因为它会造成一种曲解，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会使人曲解这样的国家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

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并根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得出如下的结论：欧洲联邦口号是不正确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6 年 1-6 月）

【志愿者的话：本文件不提供该文，请自行寻找】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

列宁（1916 年 8 月 9 日〔22 日〕以前）

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造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言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杂志[2]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 3 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罗·格里姆最近的提纲[3]也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4]和《先驱》杂志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一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的“提纲”第 5 条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20 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并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介入，因此，任何民族战争也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 1900—1914 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声称，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将以各交战国打得筋疲力竭而告结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

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12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53 页。——编者注］，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而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不愿设想，不愿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受别人的言词的欺骗。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场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再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认可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意味着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排除入侵。否定被压迫民族方面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或者否定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这个一般的考虑。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连瑞士的民兵也不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

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社会神父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死亡和流血等等，那么，相反地我们则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干巴巴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 1905 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所吓倒而灰心丧气呢？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

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会使人感到绝望。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 年 5 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5]在公社时期，妇女和 13 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 1871 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或灰心丧气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

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象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武装人民，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必然产生的幻想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已提上了国际的议事日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6]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7]，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8]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

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9]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 1914—1916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认可保卫祖国，这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更加正确，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会更加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

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个人和一文钱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亲眼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特别是从 1907 年和 1911 年以来，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无耻地剥削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且看

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我们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大概是比利时那样的吧？）中立等等。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某种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幻想的和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象《哨兵报》[10]、《民权报》[11]、《伯尔尼哨兵报》这几家优秀的报纸都已经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阿劳党代表大会[12]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决议。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种方针？

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注释：

[1]《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在通信中称之为《论废除武装》）是用德文写的。根据列宁 1916 年 8 月间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7 卷），本文应写于 1916 年 8 月 9 日以前。本文原拟在瑞士、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但是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同年 9 月，列宁用俄文加以改写，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发表于 1916 年 12 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 2 辑（见本卷第 171—181 页）。

本文最初的德文原稿到 1917 年 9 月和 10 月，才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第 9 期和第 10 期上发表出来。杂志编辑部给文章加了如下按语："现在，当列宁成为一位大家谈得最多的俄国革命活动家的时候，下面登载的这位钢铁般的老革命家的一篇阐明他的大部分政治纲领的文章，会引起人们特殊的兴味。本文是列宁 1917 年 4 月离开苏黎世前不久送交本刊编辑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这一标题看来是《青年国际》杂志编辑部加的。——86。

[2]《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于 1915 年 9 月—1918 年 5 月在苏黎世出

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青年国际（短评）》一文（本卷第 287—291 页）。1919—1941 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86。

[3]指罗·格里姆拟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该提纲载于 1916 年 7 月 14 日和 17 日《格留特利盟员报》第 162 号和第 164 号。

由于瑞士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1916 年 4 月的委托，该党著名活动家格里姆、古·弥勒、沙·奈恩、保·伯·普夫吕格尔等分别在《伯尔尼哨兵报》、《民权报》、《格留特利盟员报》上发表文章或提纲，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列宁密切注视这场争论的发展。他对争论材料的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17 卷。——86。

[4]《新生活》杂志（《Neues Leben》）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15 年 1 月—1917 年 12 月在伯尔尼出版。该杂志宣传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观点，从 1917 年初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86。

[5]这段话见于 1871 年 5 月英国《每日新闻报》，普·奥·利沙加勒《1871 年公社史》曾经引用（见该书 1962 年三联书店版第 211 页）。——92。

[6]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第二次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于 1915 年 9 月 5—8 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和瑞士等 11 个欧洲国家的 38 名代表。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来自德国的 10 名代表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 3 个不同色彩的反对派；来自法国的代表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些反对派分子。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瑞典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和挪威

青年联盟、荷兰左派社会党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也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各国代表的报告；德国和法国代表的共同声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关于通过原则决议的建议；通过宣言；选举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通过对战争牺牲者和受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

列宁积极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在会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曾于1915 年 7 月起草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6 卷第 294—296 页），并寄给各国左派征求意见。他还曾写信给季·布拉戈耶夫、戴·怀恩科普等人，阐述左派共同声明的基本原则，即：谴责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断然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口号，宣传革命行动。在代表会议前夕，9 月 2 日和 4 日之间，俄国和波兰两国代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和卡·拉狄克起草的决议草案，决定在代表会议提出按列宁意见修改过的拉狄克草案。9 月 4 日，参加代表会议的左派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

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

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列宁在《第一步》和《1915 年 9 月 5—8 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两篇文章中，对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在会上的策略作了评价（同上，第 27 卷第 42—52 页）。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 1916 年 4 月 24 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 4 月 25—30 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 40 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3 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 2 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的 3 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小组的 1 名代表、“国际”派的两名代表、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卡茨列罗维奇、意大利社会党人扎·梅·塞拉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 12 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 12—19 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者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仍然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这些国际主义分子后来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93]。

[7]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 年 3 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曾出版《活页文选》，1916 年 4 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人的支持，是 1917 年 4 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93]。

[8]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 年 1 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

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 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93]。

[9]巴塞尔宣言即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 1907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4]。

[10]《哨兵报》（《La Sentinelle》）是纳沙泰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90 年创刊于绍德封。1906—1910 年曾停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国际主义立场。1914 年 11 月 13 日该报第 265 号曾摘要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97]。

[11]《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 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97]。

[12]指 1915 年 11 月 20—21 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态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三派——反齐美尔瓦尔德派（赫·格雷利希、保·伯·普夫吕格尔等）、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拥护者（罗·格里姆、厄·保·格拉贝等）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弗·普拉滕、恩·诺布斯等）——展开了斗争。格里姆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瑞士社会民主党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赞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政治路线。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洛桑支部名义对格里姆的决议案提

出修正案，建议承认展开群众性的反战革命斗争是必要的，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格里姆的压力下，洛桑支部撤回了这个修正案，可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选派参加代表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莫·马·哈利东诺夫重新把它提了出来。格里姆及其拥护者从策略上考虑支持了修正案。结果，左派的修正案以 258 票对 141 票的多数被通过。——[97]。

战争与革命[1]

列宁 1917年5月14日（27日）的演讲

最近期间，在一切报刊上，在每次公众集会上，常常谈论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你们中间很多人，大概对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不仅相当熟悉，而且已经感到厌烦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在本区党的会议或一般的公众集会上讲话，甚至也没有出席过这些会议，因此，我很可能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也可能对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感兴趣的方面谈得不够详细。

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还引起很多也许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争论，这就是忘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我在群众大会和党的会议上曾经用心观察过对战争问题的提法，因此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产生许多争执，正是由于我们在分析战争问题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基本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并操纵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的人。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消除了人类的阶级划分之后，在消除了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现象之后，就必然会消除发生战争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同这种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碰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尤其是因为近百年来、近 125—135 年来，欧洲革命史上除占多半的反动战争以外，

也还有革命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当今在西欧，以及最近在我们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骗群众的手法，就是援引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这场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关于战争的一切议论势必都是纯粹的空话，都是纯粹字面上的和没有结果的争论。因此，既然你们要我讲战争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就来详细地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出自这样一位著作家的笔下，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过后不久，考察了战争史，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肯思考的人所接受。大约在 80 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无知的偏见，即认为战争可以同有关政府、有关阶级的政治分开，某个时候可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破坏和平的单纯的进攻，接着又是恢复这种被破坏的和平。相互厮杀，又言归于好！这是几十年前就被驳倒的鄙陋无知的观点，对发生战争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稍作仔细的分析，就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某个阶级在战前长期推行的政治，这个阶级在战时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加以推行，只是变换了行动方式而已。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8 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镇压了本国的君主之后，又用革命手段镇压了本国的地主），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不能不彻底动摇欧洲所有其他专制的、皇帝的、国王的、半封建的国家。而战争也就成为获得了胜利的法国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的必然继续，在这种战争中，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结成了有名的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国，用反革命战争对付法国。当时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

在国内第一次发挥了几百年内没有见过的最大的革命劲头，而且在 18 世纪末的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整个战略体系，冲破了一切旧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以代替旧军队，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政论家目前经常忘记的东西，看到了他们是在利用完全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的偏见和庸俗无知，而这些群众不懂得任何战争都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战前的政治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历史联系。这个阶级战前就在统治，而且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保证达到自己的目的。之所以说所谓的，那是因为它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需要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称得上是和平的。

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各民族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完全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来实现的。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往往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野蛮的摧残和屠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了解现代的战争，首先就必须对欧洲列强的全部政治作一个总的观察。不应该抓住个别的例子和事实，从社会现象的联系中抽出个别事例总是很容易的，但毫无价值，因为相反的例子也很容易举出来。应该从欧洲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整个欧洲国家体系的全部政治，才能了解这个体系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场战争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特别是资本家的报纸——不管是君主派的报纸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一样——总是企图把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历史内容和这场战争凑在一起。例如，在法兰西共和国最常见的一种手法，就是试图把法国现在进行的战争说成是 1792 年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的继续或类似那样的战争。现时最流行的一种欺骗法国人民群众、欺骗法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手法，就是把当时的“习惯语”、当时的个别口号硬搬到我们这个时代来，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共和制的法国现在也还是在维护本国的自由而反对君主制。他们忘记一个“小小的”情

况，就是 1792 年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是一个革命阶级，它实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依靠群众空前未有的英雄主义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它奋起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也只是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当时法国的战争是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继续，这个阶级举行了革命，赢得了共和国，以空前未有的毅力镇压了本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并且为了这种政治，为了继续这种政治，进行了革命战争来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两个资本主义强国集团联盟，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它们几十年来的全部政治就是不断地进行经济竞争，以求统治全世界，扼杀弱小民族，保证势力范围已囊括全世界的本国银行资本获得三倍和十倍的利润。这就是英国和德国实际的政治。这就是我要着重指出的。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那时，我们就会束手无策，被一切以谎言欺骗我们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牵着鼻子走。

我们必须全面地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厮打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整整几十年间的实际的政治。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会忘记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场战争，我们会被骗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这个骗子现在正用各地都毫无例外地惯用的那种手法来鼓吹沙文主义和煽起民族仇恨；对这种手法，我在前面提到的克劳塞维茨早在 80 年前就评述过，早在那时他就嘲笑了这样一种观点：原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后来互相厮杀起来了！似乎真是这样！不把战争同有关的国家、有关的国家体系、有关的阶级在战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难道能够说明战争吗？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是人们所经常忘记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不理解这个问题，十分之九的关于战争的谈论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对骂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说，如果你们不研究两个交

战国集团几十年来的政治（这种研究是为了避免偶然性，避免只抓个别例子），如果你们不揭示这场战争同战前政治的联系，你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

这种政治一再向我们表明，世界上两个庞然大物即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不断地进行着经济竞争。一方面是英国，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居世界首位，它创造这些财富不单是靠本国工人的劳动，而主要是靠剥削广大的殖民地，靠英国银行拥有极大的力量。英国银行比其他各国银行更先形成为数极少的——就那么三五个——大银行集团，支配着几千亿卢布，而且这种支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已经使得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的千百条绳索缠住。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这个资本已大大增长，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某些国家的界限，造成了拥有空前巨大财富的大银行集团。这个资本造成了为数极少的几家银行，于是用了几千亿卢布使这个银行网布满了全世界。这就是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情况，法国的一些著作家，例如现在由一些前社会党人（如有名的金融问题著作家利西斯）所主持的《人道报》[2]的撰稿人，早在战前几年就针对本国的经济政策写道："法国是一个金融君主国，法国是一个金融寡头，法国是一个全世界的高利贷者。"

另一方面，同这个以英法为主的集团对立的是另一个资本家集团，这个集团更加凶恶，更加富有掠夺性。这个集团的资本家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们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这就是谁也不能回避的几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只有它才能给你们指出正确解决战争问题的途径，才能使你们了解到，这场战争也是在战争中互相厮杀的那些阶级的政治的产物，是两大集团的政治的产物，这

两大集团在战前很久就已在世界各国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剥削网，在战前就已经在经济上把世界瓜分完毕。它们势必发生冲突，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重新分配统治权是不可避免的。

旧的瓜分是以英国在几百年内把先前的许多竞争者打垮为依据的。从前同英国竞争的有称霸世界的荷兰，有进行了将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的法国。英国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仗着自己商业资本的力量，通过长期战争，确立了无可争辩的世界霸权。后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掠夺者，1871 年产生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发展比英国快得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一本经济史方面的书籍不承认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德国发展得更快。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强盗的发展。它跻身于欧洲的列强，它说："你们搞垮了荷兰，击溃了法国，夺得了半个世界，劳驾也给我们适当的一份吧。""适当的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在资本主义世界，在银行界，怎样来确定这一份呢？在那里，力量取决于银行的多少，这正象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报纸以纯粹美国式的直率态度，以纯粹美国式的无耻态度所讲的那样："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银行我们要建立，我们将称霸世界。"这是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指导性报纸的声明。我必须说，这个傲慢而无耻的美国亿万富翁的这句厚颜无耻的话，要比资产阶级撒谎家的千百篇文章实在一千倍；那些撒谎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于某种民族利益，由于民族问题而引起的，他们散市诸如此类极其明显的谎言来推翻全部历史，并抓住德国强盗袭击比利时这样的个别事件[3]作为例子。当然这件事是不假的。这个强盗集团确实空前野蛮地袭击了比利时，但是它所做的，同另一个强盗集团用其他手段对其他民族在昨天所做的和今天还在继续做的并没有任何区别。

在兼并问题（这个问题我原打算把它作为引起当前这场战争的经济关系外交关系史来简略地叙述一下）上争论时，我们总是忘记，这个问题通常就是这场战

争发生的原因问题，就是瓜分侵占的土地问题，或者通俗点说，就是两伙强盗分赃的问题。我们在兼并问题上争论时，还经常遇到一些手法，这些手法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而从社会政论的角度来看，则只能叫作拙劣的欺骗。你们问问俄国的沙文主义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一定会把什么是德国的兼并这个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因为他们对这一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们请他们给兼并下个总的定义，即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英国和俄国的定义，那他们决不会满足你们的请求。他们永远下不出这样一个定义！《言语报》（为了从理论进到实践）嘲笑我们的《真理报》说："这些真理派分子竟把库尔兰看作被兼并的土地！同这种人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们回答道："好吧，那就请你们给兼并下个定义吧，这个定义要既适用于德国人，也适用于英国人和俄国人。我们再补充一句：要么你们对此采取躲避态度，要么我们立即就把你们揭穿。"［注：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127—130 页。——编者注］于是《言语报》默不作声了。我们肯定地说，任何一家报纸，无论是干脆说应该保卫祖国的一般沙文主义者的报纸，还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纸，从来都没有给兼并下过一个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俄国即适用于任何一方的定义。它们不可能下这样一个定义，因为整个这场战争是兼并政策的继续，就是说，是交战双方的两个集团的掠夺政策即资本主义抢劫政策的继续。因此很清楚，这两个强盗中究竟哪一个先拔出刀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请你们看看这两个集团几十年来的海军开支和陆军开支吧，请你们看看它们在大战前所进行的那些小的战争的历史吧，——所以说是"小的"，是因为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死得不多，而那些被他们扼杀的、在他们看来甚至不能算是民族（难道那些亚洲人和非洲人是民族吗？）的民族却死了好几十万：他们对这些民族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战争：当地的民族赤手空拳，却遭到他们机枪的扫射。难道这是战争吗？这实在说不上是战争，可以不去管它。看，他们就是这样一味欺骗人民群众。

过去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非洲、英国人和俄国人在波斯都一直在进行掠夺，屠杀整个整个民族，制造空前暴行（我不知道他们谁干得厉害些）；这场战争就是这种政治的继续。由于互相争夺，德国资本家把英国人和俄国人看成自己的敌人。怎么，你们仗着你们有钱就逞强吗？可是我们比你们更强，因此我们也有这种“神圣的”掠夺权利。这就是战前几十年英德金融资本的真正历史。这就是俄德之间、俄英之间和德英之间的关系史。这就是了解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说目前流行的那种关于战争爆发原因的说法是招摇撞骗，欺人之谈。他们忘记了金融资本的历史，忘记了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怎样酿成的历史，却把事情说成是：两个民族原来和睦相处，后来一个进攻，一个就起来自卫。全部科学被置于脑后了，银行被置于脑后了，人民被征入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的农民被征入伍。需要自卫，这就是一切！要这样来谈论问题，那彻底的办法应当是取缔一切报纸，烧毁一切书籍，禁止在报刊上谈论兼并，只有这样，这种兼并观点才能站得住脚。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不能讲实话，因为俄、英、德三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为了兼并而进行连年不断的残酷的血腥战争。自由派在波斯和非洲进行过残酷的战争；他们在印度则鞭挞过政治犯，因为政治犯竟敢提出在我们俄国有人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些要求。法国的殖民主义军队过去也压迫其他民族。这就是以往的历史，这就是亘古未有的掠夺的真正历史！这场战争正是这些阶级的这种政治的继续。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不可能作出象我们那样的答复。我们的答复是：凡是根据皇帝或政府的决定而不是根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自愿被并入另一个民族的民族，都是被兼并的民族，被掳掠的民族。放弃兼并就是使每个民族享有单独成立国家或愿意同哪个民族就同哪个民族结成联盟的权利。这样的答复，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是十分明了的。

决议通过了好几十个，甚至在《土地和自由报》[4]上也刊登过，你们从每一个这样的决议中可以看到一个表达得很糟糕的答复：我们不想为统治其他民族而

打仗，我们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所有工人和农民都是这样讲的。他们以此来表达工人，劳动者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以此来说明：如果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是为了反对剥削者，那我们拥护战争；如果是那样，我们也会拥护战争，而且不会有一个革命政党反对这种战争。他们，这许多决议的起草人，讲得不对，因为他们把事情说成好象战争是由他们进行的。我们士兵，我们工人，我们农民，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决议起草人在一次群众大会后向我提出的问题："干吗你们老是谈论反对资本家？难道我是资本家吗？我们是工人，我们在捍卫自己的自由。"这话不对，你们作战是因为听从了资本家政府的旨意，进行战争的不是各国人民，而是各国政府。如果是一个对政治没有研究、不管有幸与不幸都不了解外交秘密或金融掠夺内幕（例如，俄国和英国对波斯的压榨）的工人或农民，忘记了这种事情，天真地问，我打仗，同资本家有什么相干呢？那我是不惊奇的。因为他不懂得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懂得进行战争的是政府，而他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可以自称为革命人民，写出许多娓娓动听的决议，——对俄国人来说，这已经是不简单了，因为这种做法是不久以前才时兴起来的。不久以前，临时政府发表了一篇"革命"宣言。但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他民族在资本家写"革命"宣言来欺骗群众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他们早就打破了世界纪录。如果看一看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支持沙皇制度的共和国以来的议会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法国几十年来的议会史上，用满篇都是最漂亮词句的宣言来掩盖最卑鄙的殖民主义掠夺政策，金融掠夺政策的例子有好几十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5]的全部历史就是这种掠夺的历史。目前这场战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并非由于资本家居心不良，也不是君主们推行了什么错误的政策。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不是的，这场战争是由大资本主义尤其是银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柏林的三四家银行和伦敦的五六家银行统治着全世界，汇集着一切资金，用全部武装力量维护着自己的金融政策，最

后由于世界上再没有地盘可供自由夺取，它们就在空前残酷的搏斗中冲突起来了。结果双方总有一方不得不放弃它所占有的殖民地。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资本家的世界里是不能自愿解决的。这只能用战争来解决。所以，怪罪这个或那个戴王冠的强盗是可笑的。这些戴王冠的强盗都是一丘之貉。所以，怪罪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本家也是荒唐的。他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但他们这样做是符合文明国家所全力维护的一切法律的。"我有充分的权利，我购买股票。世界上一切法庭、一切警察、一切常备军、一切舰队都在保护我的这种对股票的神圣权利。"拥有几亿卢布的银行建立起来了，这些银行在全世界建立了银行掠夺网，它们在殊死的搏斗中冲突起来，这是谁的罪过呢？去找罪人吧！罪过在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要摆脱这种情况，除了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和进行工人革命，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党从分析战争中得出的答案。所以我们说：极简单的兼并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谎话连篇，甚至把库尔兰说成不是俄国兼并的土地。库尔兰和波兰是被他们这三个戴王冠的强盗一起瓜分的。他们已经瓜分 100 年了，他们各自撕了一块鲜肉，不过俄国强盗当时强些，因而抢得多些。当时参加瓜分的一个年轻的强盗德国，后来成长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说：让我们来重新瓜分吧！你们想保持原状吗？你们认为你们强些吗？那我们就来较量较量吧！

这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当然，"那我们就来较量较量吧！"这种挑战，仅仅是近十年来的掠夺政策即大银行政策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在兼并问题上，没有人能象我们那样把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都能理解的简单的真情实况讲出来。正因为如此，象条约问题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竟被一切报刊无耻地弄得混乱不堪。你们说，我们有革命政府，参加这个革命政府当部长的有差不多是地道的社会党人，即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可是，当这些部长声明他们主张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时候，他们却不说明没有兼并的和约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夺去德国兼并的土

地，保留自己兼并的土地），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你们的“革命”内阁，你们的关于不愿进行侵略战争、同时却要军队实行进攻的宣言和声明，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手中就有血腥的尼古拉用十足的强盗手段缔结的条约？这难道你们不知道？要是没有掠夺过别人、没有读过宏论大作的工人和农民不知道，那是情有可原的，然而现在宣扬这个的是熟知这些条约内容的有教养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条约是“秘密的”，但世界各国的外交刊物都在谈论这些条约：“你将获得两个海峡，你将获得亚美尼亚，你将获得加里西亚，你将获得阿尔萨斯－洛林，你将获得的里雅斯特，而我们则要彻底瓜分波斯。”德国资本家说：“如果你们不把我的殖民地连同利息归还给我，我就要夺取埃及，我就要扼杀欧洲的一些民族。”股票这个东西没有利息是不行的。因此，象条约问题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也使一切资本家的报纸制造了大量惊人的、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请你们看看今天的《日报》。沃多沃佐夫这个绝对没有犯布尔什维主义罪过的诚实的民主主义者在该报上声明说：我反对秘密条约，让我来讲讲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吧。同罗马尼亚的秘密条约是有的，它的内容是，如果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它可以吞并一些别的民族。其他协约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不如此。它们没有条约是不会去扼杀任何民族的。要想知道这些条约的内容，用不着去翻阅专门的杂志，只要回忆一下经济史和外交史上的一些主要事实就够了。例如，奥地利几十年来都在设法进入巴尔干，要在那里扼杀……它们在战争中冲突起来，那是因为它们不能不冲突起来。正是这个缘故，所以前任部长米留可夫和现任部长捷列先科（前者参加的政府没有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后者参加的政府有许多准社会党人部长）对于人民群众愈来愈坚决地要求公布条约的呼声，才作出这样的声明：公布条约就意味着与盟国决裂。

是的，条约是不能公布的，因为你们都是同一伙中的强盗。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条约的意见。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如

果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条约的意见，那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帮助资本家部长们继续进行战争。另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家自己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打倒资本家。哪一个结论比较正确，请你们自己去决断，但是你们必须仔细考虑后果。要是象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部长们那样去推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政府说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发表新的宣言。纸张还没有贵到连新的宣言也不能写的地步。要写出新的宣言，要举行进攻。为什么呢？目的何在呢？谁来规定这些目的呢？现在士兵们正被召去履行同罗马尼亚和法国缔结的掠夺性条约。你们把沃多沃佐夫这篇文章寄往前线吧，然后再抱怨说：这都是布尔什维克干的，这个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一定是布尔什维克臆想出来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就不仅应该取缔《真理报》，而且应该驱逐沃多沃佐夫，因为他研究了历史，米留可夫那些非常危险的书籍也必须全部销毁。请你们把这位“人民自由”党的领袖即前任外交部长的任何一本书打开看看。那都是一些好书。书中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俄国有“权利”占领两个海峡，占领亚美尼亚，占领加里西亚，占领东普鲁士。他把一切都分好了，甚至还附上了地图。不仅应当把写这样的革命文章的布尔什维克和沃多沃佐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而且也应当把米留可夫的书销毁，因为如果现在把他书中的原话收集几句寄往前线，它的煽动作用是任何一张煽动性的传单都比不了的。

按照我为今天讲话拟的简短的提纲，现在我还要谈一下“革命护国主义”问题。我想，在我荣幸地向你们作了上述报告以后，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得简短一些。

说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是革命人民，我们是革命民主派，用这些话作为借口来掩饰战争，这就叫作“革命护国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推翻了尼古拉。与推翻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相比，这个革命并不十分困难。革命以后是谁掌握了政权呢？是地主和资本家，

也就是在欧洲早已掌握了政权的那些阶级。欧洲早在 100 年以前就发生了这种革命，在那里，捷列先科之流、米留可夫之流、柯诺瓦洛夫之流早就掌握了政权，至于他们是向本国皇帝交纳皇室费[6]，还是可以不要这样奢侈，那无关紧要。不管有没有把大量资本投入租让企业，银行总归是银行，不管是在共和国还是在君主国，利润总归是利润。我们的文明的资本目前正在殖民地，在非洲和波斯设立这种美妙的银行，如果哪个野蛮国家不听这种资本的摆布，如果哪些野蛮民族不听我们文明银行的摆布，那我们就要派遣我们的军队象利亚霍夫在波斯那样，象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残暴地屠杀非洲人民那样，在那里建立文化、秩序和文明。这有什么不同呢？这同样是“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它是由不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他们看不见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知道这种政策是由条约固定下来的。条约依然存在，银行依然存在，租让企业依然存在。尽管在俄国政府中坐着他们那个阶级的优秀人物，但是世界大战的性质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新的“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是用伟大的革命概念来掩饰为了卑鄙可恶的条约而进行的肮脏的血腥战争罢了。

俄国革命没有改变战争，但它造成了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西方大多数革命也未曾有过的组织。从前的大多数革命只限于产生一个象我国捷列先科之流和柯诺瓦洛夫之流所组成的新政府，而全国仍然处于消极的、无组织的状态。俄国革命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是一个表明俄国革命能够战胜战争的苗头。这个事实就是：除了由“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组成的政府而外，除了这个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实行进攻的政府，同英法资本勾结的政府而外，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个独立于这个政府之外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网。这就是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最后使命的革命。这就是西欧在同样的条件下不曾有过的革命。这就是真正不需要实行兼并的那些阶级的组织，这些阶级没有把几百万卢布投入银行，看来，它们对于俄军上校利亚霍夫和英国自由派大使是否合理地瓜分波斯也不感兴趣。这个革命能

够向前发展的保证就在这里。就是说，这些从兼并中确实得不到好处的阶级，尽管它们过分轻信资本家政府，尽管它们有这种极其糊涂的思想，并且完全被“革命护国主义”这个概念所蒙蔽，尽管这些阶级支持公债，支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建立了一种代表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组织，这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在俄国很多地方，苏维埃的革命工作要比在彼得格勒深入得多。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资本家的中央机关设在彼得格勒。

昨天斯柯别列夫在演讲中说：我们要把全部利润拿过来，要把百分之百的利润拿过来。这是说大话，是部长式的大话。如果你们看看今天的《言语报》，你们就会看到人们是怎样看他这句话的。那里写道：“要知道这样就会造成饥饿和死亡，百分之百就等于全部！”斯柯别列夫部长比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还激进。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最左的人，这是一种诬蔑。其实斯柯别列夫部长要“左”得多。有人用最卑鄙的话骂我，说我主张把资本家几乎剥个精光。至少舒利金说过：“让他们把我们剥个精光吧！”请你们设想一下，竟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走到舒利金公民跟前去，要把他剥个精光。其实他倒更可以在这一点上去责备斯柯别列夫部长。我们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得这样过分。我们从来没有主张把百分之百的利润拿过来。但是这种诺言毕竟是可贵的。你们要是看看我们党的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443 页。——编者注］，那就会发现，我们在那里提出了和我同样的主张，而且论证得更充分。应该对银行实行监督，然后规定合理的所得税。如此而已！斯柯别列夫却建议每一卢布征收 100 戈比。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诸如此类的主张。斯柯别列夫完全是在说大话。他并不准备认真实行，即使他打算实行，也实行不了，原因很简单，既然他同捷列先科和柯诺瓦洛夫很有交情，那许下这种种诺言就未免有点可笑。从百万富翁身上拿走 80—90％的收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依靠这样的部长。要是政权掌握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那倒真是可以做到的，但也不能拿走全部，因为它们不需要这样做。苏维埃会把

大部分收入拿过来。别的国家政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从斯柯别列夫部长方面说，可以怀着最美好的愿望。这些政党我已看了几十年，我投身革命运动已有 30 年了。因此，我决不想怀疑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望。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有善良的愿望。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现在部长公民们所签署的公文已经堆满了所有办公室，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要是你们想实行监督，那就开始实行吧！我们的纲领就是这样，我们读了斯柯别列夫的演讲后可以说，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要求。我们比斯柯别列夫部长温和得多。他既主张实行监督，又主张把百分之百拿过来。我们不想拿百分之百，不过我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手干，我们就不相信你们。"我们不相信空话和诺言，也不劝别人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议会制共和国的经验告诫我们，纸上的声明不可信。如果你们想实行监督，那就应该实行起来。只要一天时间就足以颁布一项关于这种监督的法律。每个银行的职员委员会、每个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每个政党都有监督的权利。有人会对我们说，这样不行，这是商业秘密，这是神圣的私有财产！好，两条道路随你们选择一条吧。假使你们要保护托拉斯的这一切帐簿和帐单，要保护托拉斯的一切业务，那就用不着空谈什么监督，用不着说什么国家就要灭亡。

德国的情况更糟。在俄国可以弄到粮食，在德国就弄不到。在俄国只要组织起来可以办成很多事情。在德国什么也别想办到。粮食再也没有了，整个民族的灭亡不可避免。现在有人说，俄国处于灭亡的边缘。既然如此，那么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就是犯罪。因此我要问：关于监督的词句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们忘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关于监督也写过很多东西。你们可以从他那里找到很多关于监督的词句：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参议员的职责等等。革命后的两个月内，工业家们掠夺了整个俄国。资本赚了百分之几百的利润，每份报表都谈到了这点。可是当工人们在革命的两个月内"放肆地"说他们要过人的生活时，全国资本家的报刊都咆哮起来了。每一号《言语报》都疯狂地叫嚣说：工人在掠夺国家了，

我们答应的只是监督资本家嘛。不能少来些诺言多来些行动吗？如果你们想让官吏来监督，想通过从前那样的机关来实行监督，那我们党就要申明我们的坚定信念，决不在这方面支持你们，尽管你们的政府中有一打而不是半打民粹主义者部长和孟什维克部长。监督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实施。你们应当建立监督机构，即银行职员委员会、工程师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而且明天就应当开始实行这种监督。要是任何这类机构中的任何一个官员提供不真实的情况，那他就必须负刑事责任。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们想知道，现在有多少粮食，多少原料，多少劳动力，应该如何处置。

现在我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有人把一种荒谬的看法强加在我们头上，说我们想单独媾和。德国资本家强盗们在采取媾和步骤，他们说：如果你把有矿藏的土地给我，我就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一小块给你。看，外交家们在各个中立城市里讲些什么！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个事实被外交上的暗语掩盖起来了。外交家之所以是外交家，正是为了用外交语言说话。说我们主张靠单独媾和来结束战争，真是荒谬绝伦！想靠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来结束这场由各个最富有的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结束这场由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引起的战争，这种想法愚蠢透顶，甚至加以反驳都是可笑的。我们所以专门写了决议来加以反驳，那是由于这和广大群众有关，有人在他们面前诬蔑我们。但这甚至没有必要认真地来谈论。各国资本家进行的战争，只有靠反对这些资本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只要监督没有由空谈变为行动，只要资本家的政府没有被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代替，这个政府就必定只会叫喊：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现时在“自由的”英国监禁着许多社会党人，因为他们讲的话和我讲的一样。在德国监禁着李卜克内西，因为他讲了我所讲的话。在奥地利监禁着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也许已被处死），因为他用手枪讲了同样的话。世界各国工人群众的同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党人一边，而不是在那些

投靠本国资本家的社会党人一边。工人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当然，在其他国家里，革命困难一些。那里没有尼古拉和拉斯普廷那样的疯子，那里执政的是资本家阶级的优秀人物，那里不存在要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的形势，那里已经有了资本家阶级的政府。这个阶级的卓越代表早就在那里统治了。正因为如此，那里的革命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它必然要到来，尽管许多革命家会牺牲，例如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会牺牲，卡尔·李卜克内西会牺牲。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是拥护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一定会胜利。

关于美国参战一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有人常常争辩说，美国有民主，美国有白宫。我说，推翻奴隶制是半世纪以前的事情。解放奴隶的战争是在 1865 年结束的，从那时起美国的亿万富翁就成长起来了，他们把整个美国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他们准备扼杀墨西哥，而且必然会因瓜分太平洋而同日本开战。这场战争已经准备几十年了。各种出版物都在谈论这一点。美国参战的真正目的就是准备将来同日本作战。美国人民毕竟享有相当的自由，因此很难设想，他们能够忍受强制性的义务兵役，能够忍受建立一支以实行某种侵略为目的的军队，比如建立一支对日作战的军队。美国人从欧洲的例子看到这将造成什么后果。因此美国资本家就需要干预这场战争，以便找到借口，用保护弱小民族的权利这个崇高理想作幌子来建立强大的常备军。

农民拒绝把粮食换成货币，而要求得到农具、鞋子和衣服。这个主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的确，俄国遭到了严重的经济破坏，现在也出现了（虽然不太厉害）其他国家早就存在的现象：货币失去了自己的效力。整个事变进程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得很厉害，以致农民连货币都不要了。他们说：“我们要货币干什么？”他们讲得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遭到破坏，并不是由于谁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束，那就不可能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战争加速了这个进

程，这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要是历史不冲垮和摧毁资本主义，那么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它。

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农民说出了大家都看到的事实：货币的权力破坏了。在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农民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用农具、鞋子和衣服换取粮食。这就是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现实生活所提示的答案。不这样，千百万人就要忍饥挨饿，没有鞋子和衣服穿。现在千百万人面临着死亡，根本谈不上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使全部政权转到代表大多数人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这样做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谁也没有断言，这样困难的事一下子就能办好。我们根本没有这样说过。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想使苏维埃掌握政权，可是苏维埃不愿意。我们说，实际生活的经验将向苏维埃表明，而且全国人民也将看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不想“夺取”政权，因为多次革命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只有依靠大多数人的政权才是巩固的。因此“夺取”政权将是一种冒险行为，我们的党不会这样做。如果政府将来成为大多数人的政府，那它可能会实行最初确有错误的政策，然而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那时将在原来的组织内部和平地改变政治方针。别的组织是臆想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说，不能设想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怎样结束战争呢？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了政权，而德国人还在继续进行战争，那我们怎么办呢？凡是关心我们党的观点的人，可以看看最近几天我们的《真理报》，在那里，我们确切地引用了我们 1915 年在国外就讲过的话：如果俄国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应该建议媾和。如果德国的资本家或任何别的国家的资本家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那时我国工人阶级就将一致赞成进行战争。［注：见本卷第 72 页。——编者注］我们并不要求一举结束战争。我们不许这种诺言。我们不宣传按照单方面的意志来结束战争，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许这种诺言是容易的，但是无法实现。要想轻而易举地摆脱这场可怕的战争是不

可能的。战争已经打了 3 年。你们或者再打 10 年，或者去进行艰难困苦的革命。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说，资本家政府发动的战争只有靠工人革命才能结束。关心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不妨读一读 1912 年的巴塞尔宣言[7]，这个宣言是世界各社会党一致通过的，后来我们把它登在我们的《真理报》上，但是任何一个交战国，无论是“自由的”英国，或是共和制的法国，目前都不可能把这个宣言公布出来，因为宣言在战前就讲出了关于战争的真话。那里说，由于资本家的竞争，英国和德国之间将要爆发战争。那里说，火药已经装满，枪就要自动发射了。那里写着，战争将由于什么原因而爆发，还说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对那些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而又转到本国资本家政府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我们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发生了分裂。一些人当了部长，另一些人被关进了监狱。在全世界，一部分社会党人在宣传准备战争，而另一部分社会党人，如美国的倍倍尔——深受美国工人尊敬的尤·德布兹则说：“我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拿出一分钱来支持这场战争。我只准备为无产阶级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去作战。”这就是全世界社会党人分裂的情况。全世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在保卫祖国。他们错了，他们是在保卫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另一小撮资本家。我们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唯一正确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几十个人已走上了断头台，成百成千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这些坐牢的社会党人是少数，但工人阶级拥护他们，整个的经济发展支持他们。这一切向我们说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场战争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而目前我们应当准备这种革命，援助这种革命。俄国人民尽管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可是当沙皇还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要反对战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准备革命来反对沙皇和推翻沙皇。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昨天的历史向你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也将向你们证实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应当援助正在发展的俄国革命。这是我们在 1914 年底说的。因为这一点，我们的杜马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8]，可是当时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作答复。罢工停止了，杜马代表服苦役去了，一种报纸也没有了，可是你们总是谈革命！"有人就是这样责备我们，说我们躲避答复。同志们，这种责备我们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们曾经回答说：你们可以愤愤不平，但是只要沙皇没有被推翻，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反对战争的。我们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虽然还没有完全证实，但已开始得到证实。革命已开始从俄国方面改变战争。资本家们还在继续进行战争，我们说：只要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没有到来，战争就不会停止，因为要进行这场战争的人还掌握着政权。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都好象处于沉睡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党人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反对战争。"对此我回答说：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工人阶级，大家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正在成熟的革命，你们就相信资本家吧！

除了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以外，谁也不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战争不是儿戏，而是空前严重的事情，战争使千百万人牺牲，要结束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前线士兵不可能把前线同国家分开来自己解决问题。前线士兵是国家的一部分。只要国家在作战，前线就要受苦。这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战争是统治阶级挑起的，要结束它只有靠工人阶级革命。能否很快得到和平，完全取决于革命的发展。有人说得很好听，说让我们马上来结束战争吧，不管他们怎样说，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当政权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里的时候，资本家们一定会反对我们：日本会反对，法国会反对，英国会反对，各国政府都会反对。反对我们的是资本家，拥护我们的是工人。那时，资本家发动的战争就会结束。这就是我对如何结束战争这一问题的答复。

注释：

[1]《战争与革命》是列宁在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海军武备学校礼堂作的演讲。这次演讲向听众收费，所得归入 1914 年为巩固布尔什维克秘密报刊而设立的《真理报》固定基金。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听众 2000 多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士兵和军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演讲稿已经丢失，后来发现了一份不知出自谁手的这次演讲的记录，由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交给了列宁研究院，1929 年 4 月 23 日在《真理报》发表。——[77]。

[2]《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 1904 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 年，该报由马塞尔·加香领导，曾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 1920 年 12 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82]。

[3]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粗暴地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占领了比利时，企图利用它的领土对法国进行决定性打击。由于德国的占领和掠夺，比利时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濒于崩溃。1918 年德国战败后，比利时才获得解放。——[84]。

[4]《土地和自由报》(《Земля и Вол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日报），1917 年 3 月 21 日（4 月 3 日）—10 月 13 日（26 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6]。

[5]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 1870 年 9 月 4 日宣告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直存在到 1940 年 7 月。

19 世纪最后 25 年，随着法国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法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加紧推行兼并政策，并借助议会中的共和派空谈家为它粉饰。在此期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非洲和亚洲进行了一系列殖民战争，占领中非（刚果），奴役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越南和苏丹，侵略中国。——[87]。

[6]皇室费是君主立宪国国家预算中用于君主个人支出和供养宫廷的部分。——[91]。

[7]巴塞尔宣言即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 1907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8]。

[8]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在 1914 年 7 月 26 日（8 月 8 日）的杜马会议上，强烈抗议沙皇俄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他们访问了许多工业中心，召集了多次反对战争的工人集会。1914 年 11 月 2—4 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奥泽尔基镇召开了有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和里加等地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一致表示支持。11 月 4 日，他们和全体与会代表一起被捕，1915 年 2 月被交付法庭审讯，以“叛国”罪名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99]。